

|来|函|摘|登|

傲慢与偏见 不是上海人的精神面貌

◆ 汪丁丁

日前访上海宜家家居，朋友和学生同往。在宜家二楼共进午餐时，我们依序移动至前台，正要那份牛肉米饭，稍迟若干秒，或许仅仅是因果性联想，听到我的北京腔，如风似火地，两位女郎从我的右侧挤过，也就是说，她们违规抢先了。要知道，那里的围栏已经很窄，她们为什么不能安静等待几秒钟呢？她们不是一直在后面用上海话闲聊谈话吗？

我们端着各自的食物盘返回座位，远处朋友学生刚好占据了四面相邻空座。也是在若干秒的时间里，一女郎及其男友，以旁若无人状抢占了明确告示的两空座。朋友笑笑，向那位女郎解释。女郎坐下，开始摆放自己的餐具。傲慢呀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我走到她面前，怒喝一声：“嘿！你还有行为准则

吗？”语言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当你引用某一套知识的时候，在急切之中，你往往用你最初掌握那些知识时使用的语言来表达这套知识。奇怪，我使用的是英语(hei, do you have a manner?)。事后反思，我知道，我真正深刻地习得礼让行为，已经在国了。可能是“杏仁核”引发的恐惧感使然，他们两人端盘走开了。

等我终于缓过气来，学生悄悄说：老师，怕您打架，刚才那边自助饮料台发生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。根据他的叙述，一位女士逐一品尝四种饮料，每一次要灌满自己的杯子（在宜家餐饮区，交几元钱领取杯子一只，然后自助，限取一杯饮料），然后倒掉，继续品尝。这类不文明的“自助”行为，在文明国家里最

是澳门来的，当然会有所感觉。

文明是什么？不仅仅亚当·斯密说过，而且还有位历史学家兼社会理论家也说过：文明就是日益细致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要求更文明的生活和行为，这并不是虚伪！文明意味着人际交往或社会交往的伦理意识的日益复杂化，从而人们拥有了细腻的情感方式。

上述两位女士的行为表明了她们习惯的行为方式——抢夺生存空间和生存时间，旁若无人地，恰似丛林法则的再现。人口密度绝不是解释这类行为的理由。因为，香港人的行为端正得多。我的问题是：为什么以前老上海人总有一种包容精神，而现在我遭遇到的几位却是那样傲慢呢？傲慢就是自卑。这一点，我深信不疑。这自卑感从何而来？老上海人告诉我：当年在

上海的人，多是外地来的，没多少是上海本地人，但他们都以上海为自豪。这才是上海的精神。切不可将我的批评看作是对上海人的歧视。傲慢的态度与平易的态度，不是诉诸文字可以描写清楚的，但却人人能够感受到。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文字，以为是“琐碎的小事”。

我自嘲，是迂腐不能的人，每每见到上述情形便有上前管教的冲动，而且确实也屡次实施这一冲动。当然无效。因为，一个人的力量怎可改变社会？任何家庭教育，任何学校教育，任何公司教育，任何城市教育，都面临这一困境：你要教育的，是全体，而你能教育的，只是局部。或许，我们是螳螂族，如此不自量力地要劝阻人类，那真是——“螳臂当车”？

评论 07070810701

子女上岗,出示《孝顺鉴定》?

◆ 赵毅衡

报载：广东省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黄铁苗建议，为“营造感恩气氛，子女就业上岗要出示父母写的《孝顺鉴定》”。

要鉴定孝顺才能得到公职，黄研究员建议的做法，倒不是历史上第一次。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弄过一次：汉武帝需要人才管理国家，那时还没有想到考公务员，听大儒董仲舒的意见，由“郡国举荐孝、廉各一人”。到唐宋，相对比较公平的科举，才替代这种举荐道德人士当官的做法。但是地方官上书褒奖孝子烈妇，历代一直延续。

中国的孝，被许多外国观察者认为是奇观。不是说外国人不讲孝，伊斯兰教、天主教都非常重视家庭亲情。他们觉得不太理解的是把“百善孝为先”当作政治，进而把“祖先崇拜”当作信仰（认为祖宗之灵能保佑自己）。我们自己身处其中，代代相承，觉得自然而然，理应如此。如果没有其他标准，找能

行孝的人治国，也总算是找好人当官。但这样一来，孝就不是家庭伦理，成了政治伦理，通俗地说，叫做“事业助推器”。

记得去年上海有的街道，鉴于有一些子女不来看老人，决定把他们的名字挂上《不孝榜》。这就类似中国传统社会，可以告子女忤逆罪。我问计于一个熟悉市民社会的朋友，他说街道的责任，应当多放在鼓励上，出个《孝行榜》，表彰关心老人的子女，作用会好得多。我想表彰也要有分寸，不要弄出一套新《二十四孝》，那里各种古以来的特等大孝子，作秀作怪无所不用其至。那种表扬，效果就适得其反了。

但凡好事当成实用价值，就会出麻烦。这个举荐制度，成为汉代人求仕进的唯一之途，就难免弊端丛生。孝与不孝，地方上有势力的人说了算。而求官者为求举荐，作伪成了风气，史书上有记载的例子，就可以写成一本《丑陋的孝子》。

|域|外|杂|览|

起跑线在哪里？

◆ 士曾

又到了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时节，媒体报道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不妙，但好多学生挑三拣四，患得患失。工作或者职业，其实无所谓好坏。关键是看它是否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对路，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脾气，是否有助于自身特长的发展。

2003年底，日本出版了一本《十三岁孩子职业大全》，畅销至今。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当今世界五百多种职业，除了许多常见的职业，还有热气球操纵员以及南极观测队员等冷门职业，书中还细心地为“因没有任何爱好而深感失望的孩子”准备了“特别篇”。在该书前言里，作者村上龙说：“十三岁这个年龄是跨入大人世界的起点。……在这个岁数的孩子，当他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一定会有困惑和不安吧：自己将如何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样一个浑然不清的担心，和是否永远做小孩子来得更省力这样的困惑。……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显得巨大无比，于是他们就感到不安和困惑。我认为工作、职业恰恰才是通往现实这样一个巨大世界的进

口。我们正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及职业来观察、感受、思考和面对世界。请大家从本书所列的几百种工作中寻找你的好奇心的对象。我相信你的好奇心的对象最终将与具体的工作及职业结合成一体，然后它们将成为你进入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的导入口。”由此可见，我们成才目标教育和社会的就业指导，很值得借鉴东邻。

是让孩子如何从寻找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吻合的职业入手，来了解社会，认识世界，明确人生意义；还是简单选择一门能赚钱的职业。显然选择前者要比选择后者高明得多。因为孩子人生道路的选择，远比职业的选择重要得多。

当前我们的青年，尤其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，原因比较复杂。然而如果社会的就业指导和父母的教育，能眼光放长远些，不热衷于挑个高薪的行当，而着眼于青少年认识世界、培养素质。或许眼下会少些“啃老族”，日后会多些人材。

“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”不错。可是，起跑线在哪里？

整治群租房 不能忽视租客的利益

◆ 胡润忠

日前发生在浦东的“上海群租第一案”一审落槌。群租在上海的出现是近一两年的事。由于群租房侵害了其他住户的利益，它出现后很快引起广泛关注。公众舆论大多从小区居民的立场出发对其进行指责，认为一套住房内住着十几个人，作息时间不一，声音嘈杂，影响邻居生活，增加小区公共设施损耗；群租房卫生条件恶劣，有时生活污水会流到邻居家里；另外还存在火灾等安全隐患。

的确，群租房在很多方面侵犯了小区居民的利益，公众舆论关注小区居民利益是很正常的事，不过也该对群租房租客的利益给予同样的关注。

这些租客一般是在市区工作的低收入者，群租房便利的地理位置、低廉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住房需求。如果政府取缔所有群租房，他们可能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。另一方面，租客是群租房内诸多问题直接受害者。或许有人会说：这些租客是问题的制造者，他们不是受害者，其实不

然。旅馆的卫生应该由旅馆负责，这是没有异议的。100平方米的群租房里住了十几个人，类似于小旅馆，里面的卫生理应由二房东（群租房的出租人）负责。二房东不负责，如卫生间坏了不肯修，垃圾堆成山不清理，造成脏乱差，租客便是直接受害者。

本市已经出台并将继续出台一些整治群租房的政策措施。不过在整治过程中，不能忽视租客的利益。具体来说，要加强对二房东的监管，确保他们不侵犯租客利益，例如可以设立房客热线以举报二房东的违规行为。另一方面，要关注租客的现实困难。在上海房价高攀的今天，在没有足够低租价住房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加强管理、进行正确的引导。例如，可以减少群租房里的居住人数，保证有足够的卫生间，物业公司对租客的请求下可以进入群租房检查等等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变坏事为好事，既能够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要，又能够充分利用稀缺的住房资源。

|演|说|片|断|



■文化批评家齐泽克在上海社科院

冲破一种恶性循环 ◆ 齐泽克

有个故事，人类学家去考察某一原始部落。考察之前，人类学家就听说这个部落里的人会跳很怪异的舞蹈，戴着骇人的面具。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需要的那些蒙昧的东西。但当他们到了这部落时，同行的人中有人会一点点翻译，部落的人也通过翻译知道了人类学家想要看的东西。于是，第二天晚上，人类学家便看到了该部落的人们真的跳着很怪异的舞蹈，戴着骇人的面具。而这正是他们所要看到的东西，于是他们回来后写了大量论文，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——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部落戴着那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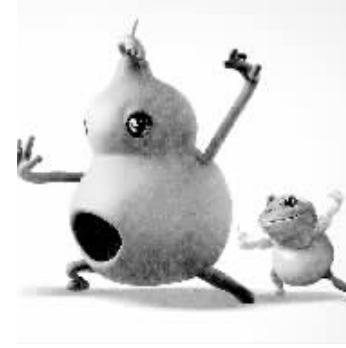
的面具，跳着那样的舞蹈。若干年后，另一批人类学家也去了，这次，他们至少学会了当地语言，他们得到的，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故事。事实是：部落的人们知道远来的客人的想法后，他们连夜照着那些说法而编造出来，跳出来给他们看。所以，可以说，这些怪异的舞蹈恰恰是基于礼貌的原因而被发明出来的。原来的那些人类学家想要看到的，便正是他们自己欲望的投射，而不是真正本真的东西。

这便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。他者想要看到这个样子，你便照着这个样子去做。希腊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忘记了自身伟大的传统，但人家说，你们可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后裔啊，那么，希腊人就认同他们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后裔。还有印度，19世纪晚期印度社会发生了变化，然而，推动印度社会向“民族—国家”变化的并不是印度的传统主义者，而是那些从牛津等大学留学回来的一批自由主义者。这些民族的认同，都恰恰是肇因于一个外部的注视。阿根廷人也是，人家说你阿根廷人是浪漫的民族，他们也就认为自己是浪漫的民族……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已足够坚强，能够冲破这一恶性循环。

陈占彪 整理

看迪士尼牵手宝葫芦

◆ 芳菲



中影集团和香港先涛用全新的电影特效手段搬上银幕时，它欣然承认，第一次与中国公司合作，从而迪士尼的家族中，多了一个纯正可爱的中国形象。

尽管这部电影由于加进了国际空间站和玩具总动员、恐龙大战等诸多科幻动画元素，跨越了故事的原创性，但电影仍将原著中具有鲜明中国人特色的伦理诉求传达出来：宝葫芦让小主人不劳而获的后果是给小主人带来无穷的烦恼；真正的快乐是必须基于自己的劳动和努力的。当有观众从善变戏法满足主人的宝葫芦联想到机器猫的时候，恰恰忽略了影片结尾小主人与宝葫芦告别这一个核心情节；而毋庸置疑，这正是中国作家张天翼的寄托所在。但比较中国人自己拍的黑白片《宝葫芦的秘密》和迪士尼彩色版中的这个结尾仍然是有意思的。50年代宝葫芦的结局是被它的小主人和同学们一起劈开烧死，而现在的结局却无限温情赚人眼泪：宝葫芦自己深感悔意，驾鸟远行，它要到远方去，想一想为

什么自己不能带给人快乐和满足。如果说宝葫芦是人欲望的象征，那么经过半个世纪的时光洗礼，它已经获得了人们更温柔的待遇。这也更切近现在中国人更温和的人性观。

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仍的今天，向外看与向内看同等重要；而创新与传统的关系，更是不可分离。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文化古国，我们至今并未能做到从自身悠久的文化中吸取活力、信心和荣耀，尚未建立起与传统的生动自然的关系。名著改编，是延续传统并赋予传统活力的一个有效方法。迪士尼因美国本土历史、文化资源有限，多多将它的创作视野拓至全球。它曾经发现过花木兰，喜悦地领略我们祖先不羁的生命活力；现在它牵手宝葫芦，发现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，通过再阐释发掘它与日俱新的魅力。事实上，不论这部刚刚公映的电影是否将获得票房上的成功，迪士尼已经在给我们发出文化自觉的提醒——对于自己的文化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读者？